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第十八卷特刊（總號第 36 號）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專號

New Directions in Taiwan Linguistics

抽 印 本

☐ 漢學研究中心 ☐

新世紀臺灣語言學研究之展望**

戴 浩 一*

一、引言

20 世紀最後十年，臺灣語言學界發生了令人鼓舞的大好形勢。政治大學、臺灣大學暨中正大學，分別於民國 82、83、84 年相繼成立了語言學研究所；86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87 年 5 月臺灣語言學學會正式成立。同時，語言學也在這幾年間成為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處一個獨立的學門。根據國科會民國 87 年的估計，至少有三百名研究相當積極的語言學家。可見這幾年來，臺灣語言學在質與量方面都有急速的提昇。臺灣的語言學家這幾年來在國際上也非常活躍，特別是在國際中國語言學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面對著新世紀的來臨，我們當然要回顧過去，展望將來。

二、西方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

現代西方語言學的進展有其特有的歷史背景，但是基本上是隨著歐美不同時代的大思想潮流跟進的。20 世紀的初期，Saussure 把共時語言學 (synchronic linguistics) 和歷時語言學 (diachronic linguistics) 分開，語言學才從印歐的比較聲韻學走進結構語言學。排除了歷史的因數，結構主義比較容

* 作者係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 本文根據作者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一週年慶祝之「臺灣語言學的展望研討會」(1998 年 8 月 13 日)的演講稿及漢學研究中心所舉辦之「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 月 14-15 日)演講摘要匯整而成。文中第四節主要內容已刊載於《臺灣語言學學會通訊》，2：3 (2000.9)，頁 1-2。

易更清楚地分析語言的結構成分及他們的相互關係。Saussure 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當時法國社會學及經濟學的影響，因為分析社會及經濟結構不太需要瞭解歷史。接著 Lévi-Strauss 把結構主義應用到文化的分析，使文化人類學大放異彩。結構主義在語言及文化的分析都偏向理性主義（rationalism），也著重在語言共性的研究，可以說是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另一方面，在美國 Boas、Sapir、Whorf 等人的人類語言學是在研究印地安語言的熱潮中發展起來，著重於語言、文化和思想三者的關係，而且強調不同語言在語言、文化和思想相異之處。他們的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sm）基本上是一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同時，在美國 Bloomfield 承襲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加上 Hockett 和 Harris 用數學的模型加深瞭解語言的結構。然而，在大學術潮流底下，美國結構主義的基本哲學和當時心理學上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步調一致，相信模仿與後天學習的重要性。

1950 年代，電腦科學的發展，尤其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產生，對心理學、語言學及心靈哲學都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導致認知科學的蓬勃發展。認知科學整合了心理學、心靈哲學、人工智慧學、語言學和神經科學。其主要的研究主題為認知行為。這門新興的科學賦予心智主義（mentalism）新的理論基礎，使行為主義（behaviorism）節節敗退。就在這個大潮轉彎的醞釀中，Chomsky 把心智主義引進語言學，復燃理性主義，奠定了衍生語法（generative grammar）的哲學基礎。Chomsky 進而把語言學研究最高的目標定在對人類心智的瞭解。從 80 年代到現在，語言的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心理歷程（mental process）和習得（acquisition）已經成為認知科學的中心課題。人性及心智發展上的大問題，如先天論與經驗論的對立（nativism versus empiricism）或天生與培育的區分（nature versus nurture），也大都圍繞著語言的習得及發展。近十年來，在科際整合的潮流中，語言學更與心理學、生理學、心靈哲學和資訊科學發生緊密的關係。如果 20 世紀是電腦研究的世紀，21 世紀應該是人腦研究的世紀。21 世紀的語言學在理論方面必然無法與腦神經系統的演化與運作的瞭解分離。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慶幸有曾志朗及洪蘭諸位心理學家為我們打前鋒，發展腦神經語言學。

三、中國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

傳統的中國語言學的主題是文字、聲韻、訓詁。其研究的目的在詮釋古典文獻，翻譯外來經文，或為作詩填詞的工具書。我們對文字及聲韻有固有（indigenous）的研究方法。然而，對中文的構詞與語法的研究幾乎都是引用基於西方語言現象而產生的理論。在這種情形下，中國語法學家從馬氏文通到現在，基本上都是用從西方語言發展出來的超語言（meta-language）來瞭解漢語詞法、語法。有些漢語語法學家過分熱中於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的追尋，往往會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先把中文翻譯成英文，再用英文發展出來的超語言及理論來分析漢語語法，以便呼應時尚的普遍語法理論。然而，仍有某些漢語語法學家嘗試利用漢語語法的特徵來詮釋普遍語法。如湯廷池的 Extended X-bar Theory，黃正德的 LF Movement 和 Empty Category，曹逢甫的 Topic-chain，及戴浩一的 Iconicity，黃宣範的 Emergent Grammar 都是利用漢語語法的特徵來詮釋人類語言的本質。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在這方面更加努力。王士元和他的同伴及學生在 1970 年代利用中國豐富的方言材料，發展出來詞彙擴散理論（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這種作法是很值得我們效法，而從這個理論所引發出來的語言演化及認知問題，也有待我們繼續探索。

四、語言的本質

語言現象有生理及心理的基礎，同時也是歷史及文化的產物。從語言本能（language instinct）的角度來看，人類語言是生理的現象，在表徵上及歷程上都受到人類生理的限制。這是人類語言共性的最大基礎。然而，語言也是傳達訊息，表達思想的工具。這個工具會因為文化及歷史背景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詞彙系統，不同的比喻方式，不同的表達方式，以達到最精簡而且能通情達意的效果。再者，同樣的物理現象，也會因為人類站在不同的角度，而有不同的認知，因此產生一種非客觀性的認知。我個人相信語言的不

同一部分來自非客觀性的認知，另一大部分則來自語言是表達文化的工具，同時又是歷史的產物。

如果我們從生理及心理的角度來研究語言，則語言學要朝著自然科學的方向前進。如果我們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語言學，則語言學不能隨意脫離人文歷史。可惜，將近半世紀的 Chomskian Revolution 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更可惜的是：今天大部分的語言學家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基礎極其薄弱，在人文歷史的素養也捉襟見肘。20 世紀後期的語言學可以說是不成熟的科學也是劣質的人文學（immature science as well as bad humanities）。

我企望 21 世紀的語言學可以從生理及心理的角度來研究，使其變成一種成熟的科學（mature science）；同時從文化歷史的角度來研究，使其成為優質的人文學（good humanities）。中國有三千年的歷史文化，漢語在語言、文字都有其特徵，在成熟的科學及優質的人文學的前提下，中國語言學家應該有無比廣闊的天空。

五、成熟的科學語言學

哲學家 Kuhn 在他的經典名著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中把一門科學的發展史看成有如一個生命的發展史，從嬰兒、小孩、青少年到成年。我們可以從語言的生理及心理基礎的角度來討論語言學科學化的成熟度。從科學發展史的觀點來看，比較成熟的科學應該至少有三個特點。

（一）Paradigm 的形成

Paradigm 不只是涵蓋一套相關的理論，而是所有從事該學門的學者對於基本現象、基本假設、實驗的程序，甚至於對這個 paradigm 所引申的世界觀都有一致的看法。舊的 paradigm 可以被新的 paradigm 所取代，但是一定要經過一段相當長時期的理論爭辯，及一系列無法反駁的新證據的支持。而新的 paradigm 所能解釋及預測的現象，範圍也要涵蓋舊 paradigm 能解釋及預測的現象。哥白尼的天文學取代了托勒密的天文學，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取代了牛頓物理都是眾所皆知的例子。1919 年的日蝕證明了愛因斯坦相對論對光射的預測是正確的。因此，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被接受為新的 paradigm 不只因為數

學精算的結果，而是對未發生的自然現象預測的成功。

（二）實驗證據的重要性

較成熟的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都要不斷的實驗，以實驗的證據來證實（confirm）或反證（falsify）假設。實驗證據最重要的是可重複性（replicability）。相同程序，相同條件，做出的實驗結果應該是一樣的。解釋（explanation）雖然重要，但是可重複性更重要。實驗室中所得到的實驗證據雖然沒有辦法完全模擬大自然現象背後的所有複雜因素，但是因為實驗室能夠對變數有較好的控制，因而能對實驗結果做出比較精確的預測，並給予較明確的解釋。

（三）與其他科學的深切關係

化學研究要依賴許多物理的知識。而生物學的研究要依賴物理及化學的知識。

現在讓我們用這三個特點來衡量語言學。語言學是否已經發展出 paradigm？我個人認為沒有。雖然從 1950 年代起，心智主義取代了行為主義，而衍生語法（Generative Grammar）形成主流，替代了結構語法。然而，就 1970 年代以後功能主義的興起及各種不同語法理論的出現，當代語言學可以說是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不同派別的當代語言學家不但理論不同，研究的中心主題不同，就連什麼才是有關的材料（relevant data）都沒有共識。比如研究篇章語法的學者不認為來自自省（introspection）的語感有很大的研究的價值。相對的，衍生語法研究者認為從片斷的自然對話找不到真正的語法規則。至於解釋的方式，形式主義者著重形式內在的解釋（internal explanation），功能主義者則著重於外在的解釋（external explanation）。簡而言之，當代語言學還是停留在 Kuhn 所描寫的 paradigm 還沒形成的階段（preparadigmatic stage）。實驗的證據在當代語言學可以說基本上不受重視。一般的語言學系都把能提出實驗證據的心理語言學置於核心課程之外。這種認知可能受到 Chomsky 不喜歡實驗的作風的影響。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因為語言學還停留在真正科學化以前的階段。四十多年來的音韻及句法研究，雖然在概念的複雜化有些成長，但是大體上還是局限於不同理論的信仰

及沒有辦法證明的爭辯 (argumentation)。當代語言學所用的證據充其量也不過是哲學家所謂的思考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s)，而不是真正的實驗證據。沒有實驗證據的理論是永遠可以自圓其說，但是永遠無法被證實或反證。所以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層出不窮，讓人眼花撩亂，有如流行服飾，來得快，去得快。四十多年來不同世代的語言學家所標榜的語言學理論，就如不同世代的人的衣著，只是反映出不同世代的風尚，而沒有真正累積科學的成果。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對心理語言學還有一個偏見。那就是許多受過衍生語法訓練的學者，把形式語言學 (formal linguistics) 等同於理論語言學 (theoretical linguistics)，把心理語言學 (psycholinguistics) 等同於應用語言學 (applied linguistics)。從實驗證據對科學發展的重要性來看，我們應該以心理語言學為中心去發展理論語言學。況且，現存的所謂形式語言學沒有數學的基礎，只有一系列的概化陳述 (generalized statement)，還是離不開臆測與哲學推理的語言學 (speculative and 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 的階段。因為大部分的語言學家不重視實驗，也沒有做實驗的基本訓練，語言學的實驗證據大部分是由對語言學不很精通的心理學家所提供的。如果我們想進展真正有科學性的理論語言學，我們應該認真地去發展以語言學為中心的心理語言學。

語言有生理及心理的基礎，但是當代語言學的研究與腦神經學、腦神經心理學幾乎完全脫離關係。這種不幸的現象，一方面是語言學家過分相信語言天生能力 (language faculty) 是一個獨立自主的認知系統，另一方面也表現出語言學至今沒有辦法和其他相關的科學連接起來。相形之下，心理學就比語言學更成熟。心理學不但要求實驗的證據，同時也要跟腦神經科學連接起來。更科學化的語言學應該能和腦神經心理學緊接一起。如此，語言學才有希望在 21 世紀變成更成熟的科學，在認知科學的範圍內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且不會停留在現在有如嬰兒蹣跚學步的階段。

六、優質的人文語言學

語言作為歷史文化的產物會存在著許多歷史的偶然 (accidences) 及文明

特殊 (idiosyncracies)。當代語言學家常爲了概化及合理化，忽視甚至於刻意抹殺偶然及特殊的存在。在這一點上，當代語言學家和早期的結構主義一樣，把歷史的遺跡拋棄，以便容易找到整齊完美的結構。殊不知人文最精彩的地方就在於這些沒法合理化，沒法融入結構系統的歷史偶然及特殊。

當代語言學家也和早期的結構主義一樣，把語言的結構看成完全獨立於文化的活動。從 Saussure 到 Bloomfield 到 Chomsky 一路走來，語言學已和人類學相距甚遠。臺灣南島語是我們語言及文化的寶藏，我們研究這些語言，不能只分析他們結構而忽略了他們的文化背景。特別是不能爲了引證語言的普遍性，去扭曲他們因爲文化而獨有的概念系統。

除了歷史和人類學，作爲人文學科的語言學也要努力和文學相連繫。文學批評與研究早已採用了結構主義。詩詞意像的創造更依賴著隱喻的投射 (metaphorical mapping) 及句法操縱。Jakobson 在語言學和文學的整合上，給了我們一個典範。

七、語言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今天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都以國際化及本土化爲目標。這兩個方向乍看之下似乎是背道而馳的。其實，他們是相輔相成的。在自然科學方面，如臺灣特有的疾病、動物、植物的研究，不但達到本土化，而且研究成果也國際化。同樣的，臺灣的語言學家有豐富的語言材料。除了南島語外，還有閩、客方言。在這方面，李壬癸及鄭良偉等人不但扮演了先知先覺的角色，而且有極爲卓著的貢獻。如何使他們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國際化，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之一。

臺灣的語料在幾方面還要有系統且大規模的去收集。現在我們有中研院語言所與資訊所聯合經營出來的以漢語書面語作基礎的平衡語料庫。目前缺乏的是漢語口語語料庫。黃宣範近年來已收集不少國語口語語料，鄭良偉也有臺灣閩南語語料庫。此外，兒童語言習得語料也極爲缺乏。中正大學的蔡素娟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已經進行三年，收集了三百多小時臺灣閩南語兒童語言習得的語料。但是語料庫的建立，如果沒有研究機構長期而龐大的人力與物力的支持（像中研院支持平衡語料庫一樣），不但研究者極爲辛苦，在進

度與規模上都很受限制。希望臺灣語言學界能不斷鼓勵及推動這方面工作。

在語料的收集方面，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大陸有極其豐富的語料，例如，梅廣、孫天心等學者這幾年來常到大陸去調查少數民族語言，這種工作雖然辛勞，卻也是我們語言學家責無旁貸的任務，應得到更多的支持與廣泛的參與。漢語方言的材料也是挖掘不完的寶藏，例如，幾年前我在臺灣雲嘉南地區調查閩南語量詞，親身體驗到方言量詞的豐富材料。中國大陸各地方言的量詞系統至今大都是粗略的描述，是亟待開發的園地。

八、結語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及臺灣語言學學會成立，證明語言學在臺灣，歷經 40 年成長，今天已經成為一門公認的獨立學門，而臺灣的語言學家也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學術力量。在此刻，我們應該緊緊地把握這個契機，藉著近幾年來所建立的勁頭，大家同心協力，分頭並進，昂首闊步，讓臺灣語言學的研究在本土化及國際化的互動中，在 21 世紀開出奇花異葩。

語言學在 21 世紀將會更科學化，語言學在認知科學的範圍內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1 世紀的語言學的尖端問題將是在生物基因 (genes) 的承襲 (genetic transmission) 及文化基因 (memes) 的承襲 (memetic transmission)，二者錯綜複雜關係的抽絲剝繭。由於生命科學與資訊科學的衝擊，21 世紀的理論語言學將會改頭換面。現行的各種理論架構將呈現力有未逮的窘境，無法應付日益龐大繁雜、多種來源的語料。21 世紀語言學的教育不但要加強語言能力，也要加強通識教育，在人文、數學、自然科學及生命科學等方面，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要廣泛涉獵科普書刊。

現有的語言學理論大多基於印歐語言的現象。在超語言 (meta-language) 上已經有根深柢固的偏見。如何利用臺灣原住民語言、漢語方言及中國境內豐富的語言資料來建立更精確完整的語言學理論，將是臺灣語言學家最大的挑戰。今天臺灣的語言學家有充分的資源，有國際的視野，應該有膽識、有企圖心，帶領著整個中國語言學界在 21 世紀走出西方的陰影。

中研院語言所在資源及人力上都是其他大學語言所不能匹比的。站在領導的崗位上，中研院語言所應該有連繫及輔導其他語言所的任務。在這個認

識下，中研院語言所的研究人員可以更進一步和其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發展共同研究計畫，定期互相借調師資，互通有無，也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確定臺灣語言學在新世紀研究的需要，協調國內幾個語言學研究所，規劃研究群，促成各個研究群「百花齊放」，使臺灣語言學既國際化又本土化，使語言學能變成成熟的科學與優質的人文學（mature science as well as good humanities），使臺灣語言學在人文與科學兩方面都有國際性的貢獻。